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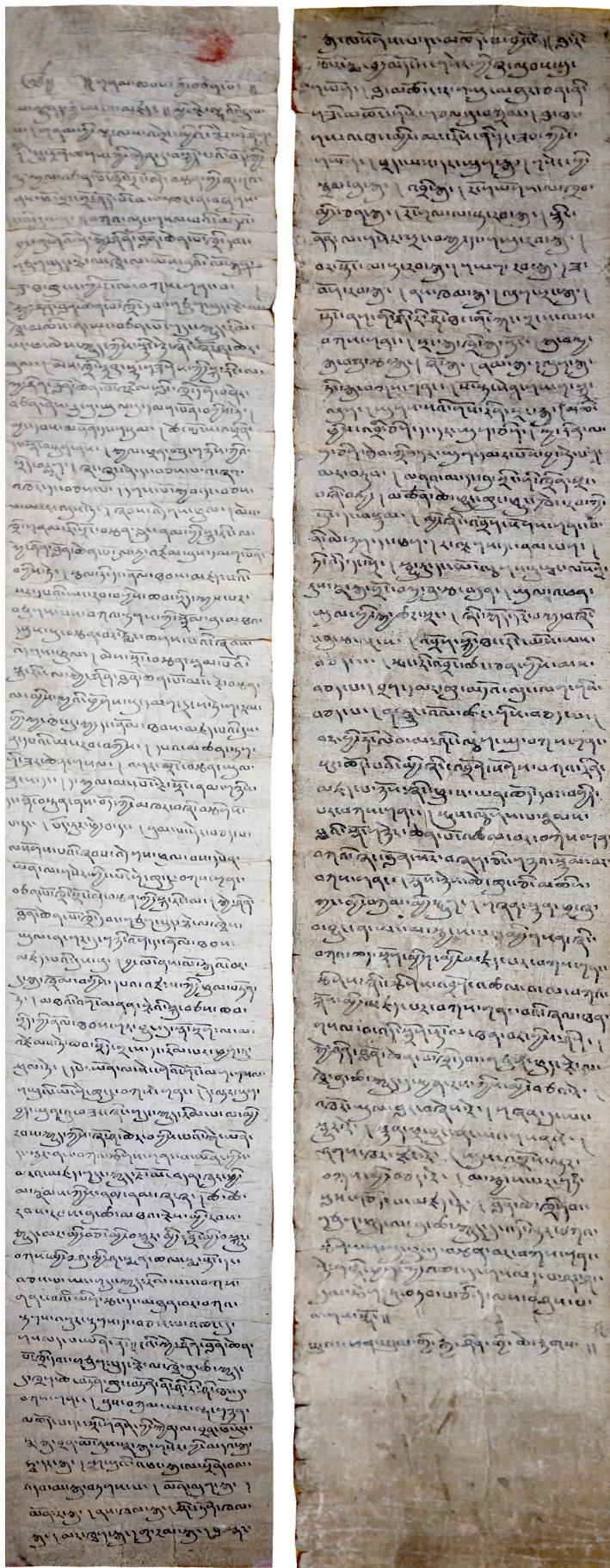
西藏西部新发现《吐蕃铁券文书》译注

阿贵 索南才旦

内容摘要：近来西藏阿里一带发现民间传抄《吐蕃铁券文书》一份，内容涉及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为其家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授予的敕文，以及该敕文在后期家族中的传承情况。虽敕文提及吐蕃赞普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及墀松德赞等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迹，但这些事迹未见于其他史料，不便随意揣测。为利学界，文章对这份文书进行转录与译注，以期为吐蕃史补充研究资料。

2018年底，达瓦教授通过手机微信发来了两张图片，是一份早期《铁券文书》的截图，本文称之为《吐蕃铁券文书》（下文简称《文书》）。第1张图片中共有文字69行，每行约有10个字，约计690余字，由于图片清晰度不高，前面的第1-26行和后面第58-69行的字迹模糊，难以全部辨认；第2张图片为第1张图片之第27-57行的内容，图片清晰，基本上可以认读全部内容。笔者当时推断，《文书》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8世纪）授予“结辛”家族的一份敕文的副本。这两张图片为《文书》的第1页，长宽不明，不见文末印章，似乎不全。

早在2018年10月，夏格旺堆曾在“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介



图一 吐蕃铁券文书(伍
金加参供图)

绍过这件《文书》，称其为《西藏札达县琼隆遗址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¹。2019年，完秀·华科加发表了题为《西藏阿里发现公元8世纪建立的扎东寺石碑内容抄写本》一文，后附有原图²。完秀·华科加根据《五部遗教》等史料，认为该文书为公元8世纪墀松德赞为结辛家族颁布，并刻于卓旭扎东寺石碑的一份敕文抄写本。后有人在网络上发布《文书》全文内容，取名《据说一琼隆银堡之僧人所提供的盟书文副本》，知其有124行³。

2019年底，伍金加参博士向笔者提供了完整的《文书》图片共2张（图一），笔者由此得以阅览该《文书》之全貌，并对有关吐蕃史部分进行了初步解读，以《一份新近发现的吐蕃铁券文书解读》和《授予西部西藏顿辛家族的敕书：与西藏吐蕃碑文的对比》为题，先后发表于《中国藏学》藏文版和英文版⁴。前文介绍了这件新发现的吐蕃《铁券文书》，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解读，后文主要将该文书与吐蕃碑文进行了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该文书虽源自吐蕃时期，但在后期抄录过程中有新的内容补录。2021年，雅荣·普布伦珠整理出版了一部《阿里曲龙寺藏珍贵古藏文写本影印录文本》，共收录藏文古籍残卷22件，其中第二件为本文所研究之《文书》，名曰《墀松德赞之敕文古籍》，公布了文书的照片并进行了全文转录⁵。针对目前学界虽有图片公布，且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文书全文转录，然至今未有汉译本的情况，本文拟对这一文书进行全文转录，并进行译注，以期能对这一重要文书有个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解题

《文书》共有124行，1200余字，是研究吐蕃历史、后弘期西藏西部历史的重要史料。文书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第1-60行为第一部分，是墀松德赞在毗瓦城（នිව

1 夏格旺堆：《西藏札达县琼隆遗址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 / 论文摘要》，2018年10月19-21日。张长虹、鲍楠：《新时代的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藏学学刊》第22辑，2020（1）：5。

2 完秀·华科加：《西藏阿里发现公元8世纪建立的扎东寺石碑内容抄写本》，《藏地阳光》（藏文版）2019（2）：53-69。

3 《据说一琼隆银堡之僧人所提供的盟书文副本》赞普仓 . 网址：<https://www.tsanpo.com/forum/29754.html>

4 据了解，2013-2015年间阿里琼隆寺一带的九座佛塔失窃，当地村民在残塔处发现了这份《文书》。参见：阿贵：《一份新近发现的吐蕃铁券文书解读》，《中国藏学》（藏文版）2020（1）：23-35。索南才旦：《授予西部西藏顿辛家族的敕书：与西藏吐蕃碑文的对比》，《中国藏学》（英文版）2021（2）：62-73。

5 雅荣·普布伦珠整理：《阿里曲龙寺藏珍贵古藏文写本影印录文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22-25。

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为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ཆོས་ཀྱི་ཤེར་ཆେན་པོ་དྲུག་པ་**）所授敕文。敕文内容涉及吐蕃历史，可细分为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和墀松德赞时期四个阶段，讲述该家族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历史事件，以及墀松德赞授予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的告身和所属物品其子孙可继承的承诺。第 61-124 行为第二部分，是墀松德赞为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及其子孙后代所授敕文，涉及当地统治者对该家族后代的种种承诺、特权及宗教仪式仪轨等。其中第 61-70 行是杀伤结辛家族子孙所需的赔偿列表；第 71-88 行是举行葬礼时所需要的供品及下葬方式；第 88-90 行是杀伤结辛家族的儿媳及姊妹时所需的赔偿规定；第 90-124 行是结辛家族所管辖的地域范围、部落群体、田地、草场以及吐蕃王室对上述特权永不改变的承诺等等。

从内容来看，这是一份吐蕃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授予古格部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的敕文（类似于后期的《铁券文书》）副本，其中的部分内容可能被重新抄录过。《文书》最初授予的时间，大约在墀松德赞在位时的某个兔年冬天。结辛家族被授予《文书》的主要原因是，该家族先人自吐蕃赞普先祖达乌聂斯（达日聂斯）时期以来，对赞普王室忠贞不二，对赞普身与政（শ්‍රද්ධාක්ෂණීති）有功。因长久以来该家族先辈们对赞普王室忠贞不二，故获得了赞普的封赏，赐予《文书》。清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也常授予某个家族类似的《铁券文书》，如 18 世纪上半叶，西藏东南察瓦龙一带的乌仓家族先后两次被授予《铁券文书》，原因是该家族先是资助修建了达杰寺，后又出资维修桑普寺热麦扎仓⁶。

关于《文书》的书写时间，从语法特征、字迹等来看，不会晚于公元12世纪。夏格旺堆先生认为，“现存文书抄本为根据墀松德赞时期颁赐的敕文而制作的备份文书，从字体特征看，这份文书的抄录时间估计为10-11世纪时期。”⁷

从《文书》内容来看，其书写时间既像是墀松德赞时期，也像是吐蕃解体后的某个时期。《文书》起首的“苍穹之赞普，厚土之领主；人君、神之化身；自天界下凡，成为直立人之王、长鬣动物之所依”等内容，与目前所见吐蕃石刻碑文之内容、文字、语法特色相近，具有吐蕃文书之特色。此外，《文书》中有几处有利于断代的内容。一是“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兔年冬末月，驻于桌旭之毗瓦官堡时，为古格部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所授圣谕之要义。”可见，该家族最初于墀松德赞时期被授予了敕文。同

⁶ 阿贵:《从两份民间文书及寺规谈达杰寺与桑普寺的关系》,《西藏研究》(藏文版)2017(3): 19-31。

⁷ 夏格旺堆:《西藏札达县琼隆遗址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第七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 / 论文摘要》,2018 年 10 月 19-21 日。

时，“吾之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其后代子孙，……”一句中的“吾”显然是指墀松德赞。

但是，目前所见《文书》显然不是吐蕃时期的敕文之原文。从“领主后人觉姆丹库尔之后代子孙等，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等内容可以看出，《文书》抄写时间应该是“领主后人”时期。《文书》中的术语也可以作为年代推断的补充资料，如“巴蒂”应是指今“巴尔蒂斯坦”，这在吐蕃文书中多见有“珠夏”（勃律）而鲜有“巴蒂”。可见《文书》中的部分内容应系后期补入。

二、文书原文及译注

۱. ﴿۷﴾ ﻰٰرَبَّا·يَسَرَّا·۸﴿سِرَّا·نَكَرَّا·سَ﴾
 ۲. سَّا·لُوكَدَ·سِرَّا·مَادَرَ·مَادَدَ﴾ ۹﴿سِرَّا·لُوكَدَ·سِرَّا·
 ۳. بَا· ۱۰﴿سِرَّا·لُوكَدَ·سِرَّا·مَادَرَ·مَادَدَ﴾
 ۴. لُوكَدَ·هَسَّا·كَهَسَّا·۱۱﴿سِرَّا·لُوكَدَ·هَسَّا·كَهَسَّا·سِرَّا·
 ۵. سَّا·لُوكَدَ·سِرَّا·۱۲﴿سِرَّا·لُوكَدَ·سَّا·لُوكَدَ·سِرَّا·لُوكَدَ·سَّا·لُوكَدَ·سِرَّا·
 ۶. كَهَسَّا·۱۳﴿سِرَّا·لُوكَدَ·سِرَّا·لُوكَدَ·سِرَّا·مَادَرَ·مَادَدَ﴾

苍穹之贊普，
厚土之领主⁹；人君、神之化
身；自天界下凡，成为直立人之王、
长鬚动物之所依¹⁰。蕃之
悉补野贊普墀松德贊之御前，
驻于卓旭¹²之毗瓦宫堡¹³

8 根据《谐拉康西碑》第1行、敦煌藏文文献P.t.1286-1第1行，此处 རྒྱତ ය应为 རྒྱତ ය的误写，后者有广阔之意，与正文第2行中出现的 རྒྱତ ය相对应。也就是说此处 རྒྱତ ය表示的是天的广阔， རྒྱତ ය则指地的深厚。

9 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中“**ସକ୍ତାୟନ୍ତରୀୟିତରଙ୍ଗୀ** ଶାହୁମଣିକାନ୍ଦାମନ୍ଦା

(苍穹之赞普，厚土之领主)”一句被改写为“**ସକ୍ତାୟନ୍ତରୀୟିତରଙ୍ଗୀ** ଶାହୁମଣିକାନ୍ଦାମନ୍ଦା

(天神下降之赞普，任运成就大地之领主)”。可参见ସୁମିଆକ୍ଷଣିକ୍ରମଦିନ୍ଦରାମାଣିଶ୍ଵରାମାଣି 2015: 115。ଦୁରମନ୍ତରଙ୍ଗାମାଣିଶ୍ଵରାମାଣି
 等 2015: 115。ଦୁରମନ୍ତରଙ୍ଗାମାଣିଶ୍ଵରାମାଣି 2006: 159。ଶୁନ୍ତରମାଣିଶ୍ଵରାମାଣି
 等 2006: 135。ଶ୍ଵରମାଣିଶ୍ଵରାମାଣି 2003: 394。但古藏文文献中的
ସକ୍ତାୟନ୍ତର 指的是“广阔的天空”，而传世史籍中的**ସକ୍ତାୟନ୍ତର** 则为“天神下降”之意。因此，与**ଶାହୁମଣିକାନ୍ଦାମନ୍ଦା**
 一起出现的**ସକ୍ତାୟନ୍ତରୀୟିତରଙ୍ଗୀ** 一句肯定是在**ସକ୍ତାୟନ୍ତରୀୟିତରଙ୍ଗୀ** 的讹传，不然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ସକ୍ତାୟନ୍ତରୀୟିତରଙ୍ଗୀ 和**ଶାହୁମଣିକାନ୍ଦାମନ୍ଦା** (天神下降之赞普，任运成就大地之领主) 之间的逻辑关系，也
 就是说，“任运成就”是土地的特征，而“神下降”不同于“广阔”一词，与天的特征没有任何关系。

10 相同的陈述见于敦煌藏文文献 P.t.1038《吐蕃赞普祖源传》第 14-15 行。多布旦、扎西才让：《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10），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93。

11 緬甸語的 緬 是 緬 的誤寫。

12 卓旭(卓^卓旭), 今西藏日喀则市仲巴县。

13 毗瓦宫堡(墀·萨·阿扎)为苯教三十七处修行地之一。参见 穹·萨·阿扎·索南·多吉著《西藏苯教与苯教徒》(1991: 148)、《西藏苯教与苯教徒》(1987: 168, 217)。南喀诺布先生认为毗瓦宫堡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市仲巴县西部, 见《西藏苯教与苯教徒》(4) (2015: 99)。

7. དཔེ་ནුས་ནු|| ལගව·ලුද·གැස·ධැ·¹⁴ඩද·
8. ཡන·ශු·ධී·ෂි·ෂ්ටි·මිත්·¹⁶ෂ්ක·කේත·ඩ·ෂි·දාය·
9. ຖ්ව්ග·හුද·හි·යා·සි·යා·යෝන·හුධි·ඩ·කුර·¹⁹
10. ප්‍රා·ඩ·කුද්ග·ත්‍රි·යා·ලගා·ලත්ග·
11. හ්ටි·මිත්·ෂ්ක·කේත·ඩ·ෂි·දාය·හ්ව්ග·හුද·හි·යා
12. ප්‍රා·ඩ·කේත·ඩ·යා·යැතත්·ඩ·හුද·කුද·රිත·
13. ඩං·ඩ·ධී·න·කුද·හිෂ·හිද·ඩ·කේත·ම·කේත·
- 时，所授圣谕之要义¹⁵
北古格¹⁷部大臣结辛¹⁸·赤旺
觉布支拉珂。兔年冬，
末月，授予（敕书）。
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
珂，此人对历代赞普（而言），
其历辈先祖，忠贞不二，势力大²⁰

14 据《拉萨王史》与《萨迦王史》、《噶举史》与《格鲁史》等古今藏文之区别，此处“噶拉”是古藏文“噶拉”的有规则性的一种拼写，即“噶拉”的古藏文“噶拉”的另一种拼写方式，敦煌文献 P.t.367、P.t.986、IOL Tib J 504 中都出现过“噶拉”这个词，所指与现代藏语“噶拉”相同。虽然“噶拉”与“噶拉”的构词方式与上述若干词汇的变化相同，但是在藏文文献中除了“噶拉”以外，似乎从未出现过与古藏文“噶拉”所指意译相同的“噶拉”这样的词。所以，此处“噶拉”是古藏文“噶拉”的一个过渡期标志。

15 相同的陈述见于《楚布江浦建寺碑》第 8 行。 དා·ජ්ං·යා·යෙන·දාය·දුණ· ප්‍රා·ඩ·කුද්ග·ත්‍රි·ඩ·ඩ්ං·ධී·න· ප්‍රා·ඩ·කුද්ග·ත්‍රි·ඩ·ඩ්ං·ධී·න· ප්‍රා·ඩ·කුද්ග·ත්‍රි·ඩ·ඩ්ං·ධී·න· 2011: 204.

16 “හ්ටි·මිත්”是“හ්ටි·මිත්”的藏语化形式，我们在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中还可见到像“ද්ග්ල්-හ්ටි·මිත්”这样的拼写，参见《萨迦王史》“හ්ටි·මිත්·ඩ·කේත·ඩ·යා·යැතත්·ඩ·හුද·කුද·රිත·” 2014: 142.

17 古格，地名，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境内。吐蕃赞普王室后裔曾建立古格地方政权。

18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结辛为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地区原象雄部落的贵族之一，《吐蕃编年史》(IOL Tib J 750: 69-70) 记载，676 年赞普墀芒论去世后，结辛·库补布（හ්ටි·හ්ටි·කුද්ග·ත්‍රි·ඩ·කුද්ග·ත්‍රි·ඩ·යා·යැතත්）与角拉仍足廓尔（ෂ්කා·ඩ්ං·ඩ්ං·ඩ·කුද්ග·ත්‍රි·ඩ·යා·යැතත්）一起心生叛逆，使整个象雄反叛于吐蕃，从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结辛家族在当地的政治及军事方面的影响力。678 年的骚动被吐蕃平定之后，与象雄首领热桑君（ඩ·කුද්ග·ත්‍රි·ඩ·යා·යැතත්）一起伏罪的有库·赤聂主松（හ්ටි·හ්ටි·කුද්ග·ත්‍රි·ඩ·යා·යැතත්），但令人疑惑的是，后者在《吐蕃大臣表》中明确记载为墀松赞（617-649 年）时期的臣子，还记载他与时任大臣噶尔·芒响木松木囊（ඩ·කුද්ග·ත්‍රි·ඩ·යා·යැතත්）发生过冲突。故笔者以为 678 年赞普降罪的库·赤聂主松很可能是结辛·库补布，是《编年史》编纂者因两位姓名中均有“库”一字而导致混淆。此外，约翰·莫克在瓦罕走廊卢普苏克（Lupsuk）河谷发现的古藏文石刻文中记有结辛·甲勒悉丁（ඩ·බේත්-හ්ටි·කුද්ග·ත්‍රි·ඩ·යා·යැතත්）一名（John Mock, "The Red Buddha Hall Road Revisited,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betan and Tang Empires in Afghanistan Wakhan."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45, 2018: 94-95, 98, 图 4-5, 7），武内绍人在拉达克阿契寺附近发现的古藏文石刻文中有“猴年，结辛”一句（Tackeuchi Tsuguhi, "Old Tibetan Rock Inscriptions Near Alchi." *Journal Research Institut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 49, 2013: 35），笔者也在新疆麻扎塔克出土的古藏文文书（M.Tagh.b.ii.0062/Or.15000/219）中发现有关于结辛家族的相关记载。总之，结辛家族虽不为吐蕃王室史家的笔下所青睐，但上述零碎的史料已经证明该家族为公元 7-10 世纪中央欧亚东部最活跃的吐蕃豪族之一。关于结辛家族在古格王朝早期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可参见索南才旦：《授予西部西藏顿辛家族的敕书：与西藏吐蕃碑文的对比》，《中国藏学》（英文版）2021 (2): 73。

19 根据语境，“තුර”是“හුද”的另一种拼写，但吐蕃时期似乎并不流行这种写法。

20 此处藏文“ඩ”具有“力量”或“势力”的意思。参见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86，注释 317。

14. གྲྙ་ ອිවා ສි ສ්වෑධ්‍ය ແລະ²¹ ສු ສම්බිජා ສු ສූ ສූ ຕිද ບා ·

15. ສු ມික ສ්වෑධ ຂේ ຕර ວ ວ ພ ສි ສ්වී ປ²² ສි ສූ ຕි ສ ສ ຕ ຕ ຕ

16. ສ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ຕ

17. ສූ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18.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19. ສූ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20.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21.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ດ

献。先祖赤达乌聂斯²² 时期，大臣结辛·瞻林赤顿协尔赞尼，于突厥²⁵ 境任大将。(他)与娘、温、农三(氏)、蔡邦氏程²⁷ 等联合。十二小邦失政权。象雄等部，阿柴²⁹ 人等，塔波³⁰ 觉等，也都被招致麾下。(以此)服侍(赞普王室有功)。先祖

21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古藏文史料，吐蕃赞普墀松赞（617-649年）的祖父之名为 བྱଣ སྤ୍ରୁ རྩ୍ବେ རྒୋ རྒୁ རྒୁ རྒୁ，而从未出现过 རྒୁ རྒୁ 的这样的拼写。

众所周知，关于吐蕃赞普的选立仪式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继承者的改名过程。据史料分析，至少从墀松赞（墀松赞）父亲墀论赞（墀论赞）开始，一直到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墀达磨吾董木丹（墀达磨吾董木丹）为止，历代赞普选立的仪式过程中都有在其名前冠以“墀”字的制度。但是此文书及敦煌藏文文献 P.1144 的发现，对我们对吐蕃时期赞普选立仪式中的改名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吐蕃王权的构建在墀松赞的祖父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

23 眇部洲为梵语 Jambu 的音译及缩写，瞻部为 dvīpah 的意译，即 Jambudvīpah（瞻部洲）。

²⁴ 突厥，突厥之藏文名称，在古藏文文献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即 རྩ୍ମ ། རྩ୍ମ ། རྩ୍ମ ། 和 རྩ୍ମ ། རྩ୍ମ ། རྩ୍ମ །。突厥在后突厥及东回鹘时期的碑文中写作“*türk*”，一般转写为 *türk*。古藏文文献中的 རྩ୍ମ 与 *türk* 相同，而 རྩ୍ମ 则更近于 *türkü*，即伯希和所说的以 -ut 为复数的 *türküt*，当然，在古藏文文献中其尾声 -t 是脱落的。关于突厥名称的讨论见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8-53。

25 突厥，藏文称“珠古”，是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又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540年，突厥这个词始见于中国史册。744年，葛禄逻、拔悉密与回鹘联合攻灭后突厥汗国，东突厥诸部或者在战争中消亡，或者融入回鹘，或者融入唐朝。正文中出现的楚地名同《吐蕃编年史》中的楚一样，可能指原西突厥势力下的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地区。

26 𠙴 在古藏文文献中的拼写形式是 𠁽𠁾𠁻𠁺，而后弘期以后逐渐出现其固定的拼写方式 𠁽𠁾𠁻。因此，我们认为此处 𠁽𠁾 中的 𠁻 的上加字 𠁺 应为 𠁽 的后加字，这种拼写方式可能与该文书撰写时期的语音变迁有关系。

²⁷ 与这一叙述方式相同的见：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61。

29 阿柴（吐谷浑），古族名。原为鲜卑一支，游牧于今辽宁一带。公元4世纪初，其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一带。藏文史料所说之阿夏，也译作阿柴，可能是指西迁后曾活动于今甘肃、青海间的古代部族，其族群成分除了鲜卑，可能还融入了本地吐蕃人等其它成分，从公元663年一直到9世纪作为吐蕃的属国而存在。

30 塔波，古吐蕃小邦名，领地应今山南加查县、林芝朗县一带。

³¹ 第 17-21 行叙述同样见于底吾·璆赛的教法史中，唯一不同的是第 20 行最后字 契（背）在《底吾史记》中记作 契奴（奴仆）。*ଓଡ଼ିଆ ଶାସନ କଣ୍ଠରେ କେବଳ ଦୟାକାରୀ ମଧ୍ୟ ପରିଚାରକ ଭାଷା ମହାଭାବତାନ୍ତରାଜି ଦ୍ୱାରା ଲଙ୍ଘନ କରାଯାଇଛି।* 1987: 109.

22. དྲི·གྲତ୍ତବ୍·ସେ·ସୁର୍ଦ୍ଧ·ସକର୍·ସୁନ୍ଦ·କର୍ମ·ସ୍ତ୍ରୀ·ସୁର୍ଦ୍ଧି·ସ୍ଵର୍ଗ·
墀囊日松赞隆朗时³²,
23. ཆଁ·ସେକ୍·ସ୍ତ୍ରୀ·ସ୍ଵର୍ଗ·କେତ୍·ସ୍ଵର୍ଗ·ଅନ୍ତ୍·ସର୍ଵଶ୍ରୀ·ସ୍ଵର୍ଗାନ୍ତ୍·
大臣结辛·阿雅杂木苏任大将军,
24. ཆଁନାଟି·। ཆଁନାଟି·³³ଦନ୍ତ୍·କୁଳ୍·ସମନ୍·ପାହନ୍·ପାହି·
进军巴尔蒂³⁴时,
25. ସର୍ଦ୍ଧାନ୍ତି·ୟ·ର୍ମା·ସମ୍ମିନା·କଣା·ସ୍ତ୍ରୀଦ୍ରୁଷ୍ଟା·ର୍ମା·
英勇无比。使政治兴盛。
26. ସର୍ଦ୍ଧାନ୍ତା·ପାନ୍·ପାଗାନ୍·ଫ୍ଲାମା [କଣା] ପ୍ରୋକ୍ଷାନ୍·ପାକାର୍
(得) 敕文匣子。(使吐蕃) 边
27. ଦନ୍ତା·ସୁ·ସକର୍·ସର୍ଦ୍ଧାନ୍ତି·କଣା·ପାହି·ଭାଷା·
中部(各地)稳固,(成为王室)秘密
住地,(以此)献上
28. ଏନ୍ଦିନା·ସୁତ୍ୟା· କେତ୍·ସୁର୍ଦ୍ଧାନ୍ତି·ସକର୍·ସ୍ତ୍ରୀ·ସତି·
服侍。先祖松赞干布
29. ଶ୍ରୀର୍ଦ୍ଧାନ୍ତି·ସେକ୍·ସ୍ତ୍ରୀ·ସ୍ଵର୍ଗ·କେତ୍·ସ୍ଵର୍ଗ·ଅନ୍ତ୍·ସକର୍·
时,大臣结辛·芒布支赞
30. ଆଁନାଟି·ସ୍ତ୍ରୀଦ୍ରୁଷ୍ଟାନ୍·ପାନ୍·ପାଗାନ୍·ଫ୍ଲାମା·
拉尼,进军汉地。(于)噶当木
31. ଶ୍ରୀ·ସୁ·ସର୍ଦ୍ଧାନ୍ତି·କୁଳ୍·ଦନ୍ତ୍·କୁଳ୍·ସମନ୍·ପାହନ୍·ପାହି·କୁଳ୍·
之甲塘地方与中原对峙时,
32. ଶ୍ରୀ·ସର୍ଦ୍ଧାନ୍ତି·ୟନ୍·ର୍ମା·ସମ୍ମିନା·। ଦନ୍ତା·ପାକାର୍·ଫ୍ଲାମା·
英勇无比。(为此)得虎皮
33. ଶ୍ରୀ·ସର୍ଦ୍ଧାନ୍ତି·ସାମା·³⁷ଏନ୍ଦା·ସୁର୍ଦ୍ଧାନ୍ତି·ସକର୍·ଭୂତ୍·
之缎鞯³⁸。(他)与噶尔·东赞王

32 为墀松赞之父。在该赞普时期,吐蕃开始征服拉萨河流域之森波杰小王,为建立吐蕃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此事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墀囊日松赞隆朗,我们知道墀松赞之父在位时期的王号为墀论赞或墀论赞论朗,而囊日松赞为“社稷比天高,兜鍪比山坚”中的天、山、坚三个因素构成的,是群臣所上的尊号。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吐蕃时期的正规文书中从未见过王号与尊号所混合的这种现象。

33 根据古藏文文献中的象雄地名、人名等词汇的构词方式,此处 ༄ ຈ ຈ 也可还原为 ຈ,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P.t. 997: 4)也曾出现过 ຈ ກ ກ 这样的官职,但 ༄ ຈ 本身可能跟梵语 *arya* (圣)有关系。

34 ଏନ୍ଦାସୁ 为梵语 *Jambu* 的音译。

35 ଆଁନାଟି, 译作巴尔蒂。《太阳王系》(ଡିଆରିଣନାସ୍ତ୍ରୀକୁଳ୍ସନା 2014: 112.) 记载墀都松 (676-704 年) 执政时期的疆域西至 ଶାଖାଫୁନ୍ଦାର୍ଗୁର୍, 此处 ଶାଖାଫୁନ୍ 无疑指巴尔蒂国,而 ଫୁନ୍ଦାର୍ଗୁର୍ 又是巴尔蒂国或大勃律国境内一地名。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敦煌有很多来自 ଫୁନ୍ଦାର୍ଗୁର୍ 的写经生 (P.t.1614/1620/1621/1622/1628/1638/1655/1760)。吐蕃时期勃律国一般称为 ଫୁନ୍, 后弘期以后逐渐形成并统一了 ଶାଖାଫୁନ୍ දି这一写法,所以学界一般认为 ଶାଖାଫୁନ୍ දି这一地名为后弘期之产物。但笔者发现新疆出土古藏文简牍 M.Tagh.a.iv.0026 中有 ଶାଖାଫୁନ୍·ପୁର୍ବ·ଫୁନ୍, ଶାଖାଫୁନ୍ දି可能为 ଶାଖାଫୁନ୍ දି的古藏文写法。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吐蕃在公元 8 世纪早期吞并大勃律后于其境内可能就设置了 ଶାଖାଫୁନ୍·ପୁର୍ବ·ଫୁନ୍ (巴尔蒂小千户) 这一军政体制。

36 巴尔蒂,地名,又称巴尔蒂斯坦。古称勃律,古藏文称 ଫୁନ୍ (珠夏),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流域(发源于青藏高原地区的冈底斯山脉)中世纪古国名。勃律分大小,大勃律以巴尔蒂斯坦为中心,属吐蕃所管,而小勃律位于吉尔吉特,与李唐亲近。

37 ଏନ୍ଦା ଯ ଏନ୍ଦା。

38 为勇者六标志之一,与汉文史籍中的大虫皮相同。敦煌藏文文献 P.t.1089、1217、Or.15000/268 中都出现过此种大虫皮名称。斯坦因在新疆安得悦 3 号遗址墙上发现的藏文题记中也出现过 ଶାଖାଫୁନ୍·ପୁର୍ବ·ଫୁନ୍, 但那时学界还未能解读出其与吐蕃大虫皮制度之间的关联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stan*, Vol.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569)。索南才旦对该题记进行了解读,参见索南才旦:《吐蕃大虫皮制度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70-74。

³⁹ 嘎尔·东赞（？-667年），又称噶尔·东赞域松，汉文史料称禄东赞，松赞干布和王孙芒松芒赞时期的著名重臣。

⁴¹ 詹敦仁《西藏古史》(吐蕃四宫堡)不见于其它古文献和史籍中,笔者怀疑此处“藏敦仁”可能为“藏敦斯”的误写,藏敦斯《西藏古史》见于很多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中,指安西四镇。

⁴² 索波在学界一般译作苏毗，其实苏毗为藏文 索波 (P. t.1286: 15) 之音译，而《新唐书·苏毗传》所记之号“孙波”才是藏文 索波 的音译。见《新唐书·苏毗传》卷二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6257。

43 “茹”意为“翼”，吐蕃有“四茹”即“四翼”，是吐蕃军事编制名称。四茹：乌茹、约茹、叶茹和茹拉。四茹之地理范围，乌茹，以今拉萨小昭寺为中心，东至今山南桑日县境内的沃卡地区，西至拉萨尼木县；约茹，以雅砻昌珠寺为中心，东至今林芝县境内，西至今仁蚌县境内之卡热山；叶茹，以雅鲁藏布江北岸之香（今日喀则南木林县境内）地方为中心；茹拉，包括了今后藏之西部拉孜县等地区。

⁴⁴ 松巴，吐蕃早期小邦之一。吐蕃时期，建立有松巴茹（翼）。根据其他早期藏文史料，松巴茹所在的地理范围应是在吐蕃与下部象雄（羊同）之间。详见《弟吴宗教源流》吐蕃部分相关章节内容。

45 欣_喜应为 欣_喜·_舍的缩写，与敦煌藏文文献中的 欣_喜·_舍·_桑、 欣_喜·_舍·_拉 等构词方式相同。

⁴⁶ 为吐蕃告身之一，据《贤者喜宴》，低级囊论，中级噶论（宰相同平章事）可授小金字告身。དྲୟାମ୍ବଣ୍ଡା କ୍ଷଣ୍ଟରୁଦ୍ଧାବାନାଦ୍ୱିତୀୟକା ପିଟିଂା ଶିର୍ଦ୍ଵାନାଦ୍ୱିତୀୟକା 2006: 103. 但据敦煌文献 P.t.1089，吐蕃属国于阗的阿摩支、边镇万户长等官职也授有金字告身。因此，吐蕃时期所授告身主要还是以其对社稷的贡献有关，而不是传统史籍所记那样成文不变的。

47 空为凵的另一种拼法，如在敦煌藏文文献 P.t.126: 34-35 中ཡེ་ཤེ་དྲ和ཉེ་ཤེ་དྲ写作ཡེ་ཤེ་ཀླ和ཉེ་ཤེ་ཀླ。

43. ནු·ණු·ෂ්ටා·ථුෂ්ඩා·ද්වාත·වෙදනා·ෂ්ටූ·සුජා·සරිජ
44. ຕ් එ පාසධි·ව්‍යෝ·යකඟ·හිඳි·සු·යත්තා·කඟ·
45. සිද්‍යු·ව්‍යා·සත්තා·සත·සුද්‍ය·නුද්‍යු·ව්‍යා·ව්‍ය·
46. ව්‍යෝ·ත් ත් ·කඟ·සිද්‍යා·ද්වාත·ද්වාත·ව්‍යා·ව්‍ය·නු
47. සුජා·ත් එ දැඩි·යේක·⁴⁹ව්‍යා·සිද්‍යා·ප්‍රාථ·⁵⁰සාමාය·⁵¹
48. සයුදිපිශිල්ල·[කුද?] ස්ථාගා·යකඟ· දිජ්ඛ්‍රා·සුජා
49. ව්‍යද·⁵⁴පුජ·නු·වෙද·විද්‍යා·සුද්‍ය·නුද්‍යු·ව්‍යා·ව්‍ය·
50. රුෂා·සුද්‍ය·ෂ්ටා·ව්‍යා·සිද්‍යා·යේක·යේක·
51. ද්වාත·ත්තා·යගා·ව්‍යෝ·යේක·⁵⁶සාමාය·ව්‍යා·යේක·සුජා·
52. පාදව·චාර්ද·ව්‍යාද·සුද්‍ය·නුද්‍යු·ව්‍යා·ව්‍යදක·ව්‍යා·ව්‍ය·
53. ච·ක්‍රාගා·සුජා·ත්තා·ත්තා·ව්‍යා·ව්‍ය·⁵⁷යේක·යේක·
54. රුෂා·රුෂා·සුද්‍ය·ව්‍යෝ·ව්‍යා·ව්‍යා·ව්‍ය·
进行九次大战⁴⁸。逞勇、贤之能。
威镇边疆，以护王之身与政，
有功如前。时不顾自身
安危，政功如数献
上。获得狮皮领衣⁵²。
授予小玉字告身⁵³。如此，
拥有极好的赐品⁵⁵。历代赞普时期，
其历辈先祖及其后人尽大服侍。
(因此) 赐予私人财产。
同时吩咐。后，
领主后人、觉姆、丹库尔之后代子孙
等，永永远远，世世
代代，一切后人，对其(结辛家
族)后

⁴⁸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敦煌西域出土古藏文史料，**羌**至少有两种意思：一为吐蕃其东北边疆所新设的军政单位，如河州军镇体（羌·苏·羌·卡·羌）⁵⁰、故臧军镇（噶·扎·羌·苏·羌·卡·羌）⁵¹、瓜州军镇（羌·苏·羌·卡·羌）⁵²、萨毗军镇（卡·羌·羌·苏·羌·卡·羌）⁵³等；一则指作战时期的临时驻军，这一意义在古藏文《吐蕃兵律》中尤其明显。因此，正文中所说的**羌·苏·羌·卡·羌**指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在外进行九年的军事活动。

⁴⁹ 见注释 45。

50 烟应为蓑（蓑）的误写。

51 ସନ୍ଧାନ ମଧ୍ୟ ସନ୍ଧାନ ।

⁵³ 为吐蕃告身之最高等级，分大小玉字告身。据《贤者喜宴》，中级贡论，大囊论可授小玉字告身。⁵⁴ དཔེ་ཆུ་
གྲୁଁ་ལྷ་ འିନ୍-ସା କେଣ୍ଟାଦ୍ୱାରା ଆପଣ ଧରିଦ୍ଵାରା ଶ୍ରୀଜିତ 2006: 103.

⁵⁵ 如前所述, ལྷ་ཤད སା ལྷ་ཤା སା 同, 根据敦煌文献 ལྷ་ཤା སା 包括牲畜、衣服、财产等等。按字意 ལྷ་ཤା སା 本意为个人所使用的用品, 因此, 克利弗兰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扳指杯底部的藏文铭文可译为“潘辛孔结的生活用品”。正文中指赞普为结辛家族所授予的各种特权和告身等, 故译之为赐品。

⁵⁷ 僧阿闍梨的重叠式合成词，阿闍梨与阿闍梨同。除了阿闍·阿闍梨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阿闍·阿闍·阿闍梨、阿闍·阿闍·阿闍·阿闍梨等形式，吐蕃碑文中一般以阿闍·阿闍·阿闍·阿闍的形式出现的。

55. ཐୁଦ୍-ବର୍ଣ୍ଣ-ଶତଶ୍ଚି-ମନ୍ତ୍ରଶ୍ଚି-ମହାଶ୍ଚି-ମନ୍ତ୍ରଶ୍ଚ-
56. ସଗରଶ୍ଚି-ମସ୍ତୁଶ୍ଚି-ମଞ୍ଜନ-କଲା-ଶ୍ଵର-⁵⁸ଦୂ-
57. ମତନ-ଧ-ୟନ-ଶନୁ-ଦୁଃଖ-ଦେଖ-ଧନ-ମଗର-
58. ଶବ୍ଦ-ଧରି-ଧିନ-କର-ଦର-ଧରୁ-ଧର-ମଗର-
59. ଛାପନ-ଦସୁ-ଛାପନ-⁵⁹ଦର-ମତନ-ଧ-ମକର-ଦୁ-
60. ମାତର-ଧ-⁶⁰ଧିକ-ର୍ତ୍ତ୍ଵ-|| ଧରି-କ୍ଷେ-ମିଳ-ଶ୍ଵର-କ୍ଷେ-
61. ମୁଣ୍ଡ-ନନ୍ଦ-ମର୍ତ୍ତ୍ଵା-ନନ୍ଦ-ହି-ମୁଣ୍ଡ-ନ-କ-ଶୁଦ୍-
62. କୁଣ୍ଡା-କେ-ମର୍ତ୍ତ୍ଵ-କର-ମର୍ତ୍ତ୍ଵି-ମର୍ତ୍ତ୍ଵ-ମର୍ତ୍ତ୍ଵ-କୁ-
63. ମଗର-ମର୍ତ୍ତ୍ଵ-। ଶୁଣ-ମଗୁକ-ଯନ୍ତ୍ର-ଛି-ମର୍ତ୍ତ୍ଵ-
64. ଏକର-ଧ-ନନ୍ଦ-ଶି-ଶର୍କର-ଶ୍ରୀ-କ୍ରୂର-ଲ୍ଲ-ମର୍ତ୍ତ୍ଵ-ନୁ-
65. ଛା-କୁ-ମର୍ତ୍ତ୍ଵ-ର୍ତ୍ତ୍ଵ-ନୁ-ଶୁ-କୁ-ମର୍ତ୍ତ୍ଵ-ଶ୍ରୀ-ମନ୍ତ୍ର-କୁ-
66. ଦୂ-ନନ୍ଦ-⁶³କୁ-। ଶଖୁରି-ମନ୍ତ୍ର-କୁ-ପଶ୍ଚିମ-ମନ୍ତ୍ର-
67. ନନ୍ଦ-ଧ-କୁ-ମନ୍ତ୍ରନନ୍ଦ-ଧ-। କ୍ଷେତ୍ର-ଧୂମ-କୁ-।
68. କ୍ଷେତ୍ର-କୁ-। କର-ମନ୍ତ୍ର-କୁ-। ମିଳ-ମର୍ତ୍ତ୍ଵ-ମନ୍ତ୍ର-
69. କୁ-। ଅର-ମନ୍ତ୍ର-କୁ-। ଶୁ-ନନ୍ଦ-କୁ-। କା-କଙ୍କ-
人不得改写，不得变更，不得减少，不得弃之，
不得（另）下敕文以剥夺（财产）。
复仇、奖惩、（死伤）赔偿等，也要与历代先王所赐
敕文相符合。文印口谕⁶⁰等
授之。吾之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其后代子孙，
(若遇)被杀或被伤，在西日西塘，
赠赐。(无论)被何人所杀，天神和聂神
(需)供奉。为镇斯魔⁶²，需用九氏
男奴、
九氏女奴、九支金箭、
九匹花帛、九件玉质纺锤轮丝绵
九叶装饰、九只门地的绵羊、
九只门地的山羊、九克青稞、干果
九克、九克酥油、九古让、岗

⁵⁸ 虎可能是虎的误写，敦煌藏文文献 P.t.1073《纵犬伤人赔偿律》中记作虎，即受伤，现代藏语为虎。

61 爲甚麼即為甚麼。

62 斯(毘)在敦煌藏文占卜文献中也出现过很多次,学界一般理解为魔鬼。藏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毘的时候一般指一种定期的死亡率,该文书中的毘指的是也是一种定期的或循环的死亡率。也就是说镇压斯魔的目的是防止此后在同一个时间或因同一个事件导致家族人死亡。

63 显然ចុណា的ចុ是一个借词，在敦煌藏文文献 P.t.1290: 8 中有“ពិចេរ៉ែន្តាល្អាចុប្បន្ទោន្តសារិច្ឆេរ៉ែន្តាល្អាចុប្បន្ទោន្តសារិច្ឆេ”一句，其中的ចុ肯定是指汉语“花”的音译。在语言学中此等构词结构称之为对偶词，是一个原有词和外来词表示一个事物的合成词。因此，笔者以为此处ចុ也是汉语“花”的音译，ចុណា可能指一匹有花纹的绢帛。

70. ສු·යෙෂණා·ස·දා·කක්ද·යනුත්වා॥ තැං
 71. සු·රි·කා·ප·යදානා·යැලිස්ත්‍රී·බුදුසා·⁶⁴තු
 72. ගයෝගා॥ තැංක්ද·යනුත්වුදුරු·කඩ·ඩි
 73. මැංකක්ද·[කක්ද] විෂ·යරුත්ද·යනා॥ තැං
 74. ගයෝ·යනුත්‍රින·යන්දින·⁶⁷ඩි·දා·යනුත්‍රින·
 75. ගයෝගා॥ දහ·යනා·දා·යනුත්‍රා·තු॥ මැලිස්ත්‍රී·
 76. සුඩා·තුත්‍රා· ඩිං·තුත්‍රා· රු·ගයෝගා·ය·යා·
 77. ත්‍රිද·කඩ·තුත්‍රා· රු·යා·⁶⁹ය·ස්ථා·⁷⁰යා·තුත්‍රා· ඩිං·
 78. ඩේක·ය·යැලිස්ත්‍රී·යනු·යනු·දා·යනු·යනු·තු॥
 79. යන·ස්ථාද·ය·ස්ථා·⁷²යා·තුත්‍රා· ගයෝ·යා·තුත්‍රා· ඩ·
 80. ඩේම·යා·තුත්‍රා· ත්‍රා·යා·තුත්‍රා· ප්‍රේම·යා·තුත්‍රා·

九等供奉。拉日山
 波日山，要用由金布满⁶⁵的孔雀羽
 盖以；拉措达热玉托坚⁶⁶湖
 要铺满天珠；拉塘
 亚塘棋子纹⁶⁸，（要用）丝绸
 铺盖。池叶需九条绸缎、九章布金
 钱、
 九头母牦牛。铺盖尸体需要铠甲
 有名者九件。为驮尸体需九匹良
 马。为镇心⁷¹，
 需百两金子和九件上品玉器。
 为空地⁷³，需九匹良马、九头上等
 牦牛、上等萨
 沃锦缎九件、九克⁷⁴青稞、九只绵
 羊。

⁶⁴ 虽然没有后加字“々”，与ସ୍ମୃତ୍ୟୁସନ相同的词见于吐蕃时期马鞍的组件上（ସ୍ମୃତ୍ୟୁସନ୍ତିର୍ମୁଦ୍ରାଶାସନ୍କାଳେଷ୍ଟାକ୍ଷତାଲ୍ୟନକ୍ଷଣିତିଶା ସମ୍ବନ୍ଧକ୍ରମାନ୍ତର୍ମୁଦ୍ରାଶାସନ୍କାଳେଷ୍ଟାକ୍ଷତାଲ୍ୟନକ୍ଷଣିତିଶା），见 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1, 2013: 282.

⁶⁵ 如前所述, རྒྱྲୟ රྒྱྲୟ 一见于吐蕃时期一件马具组件的铭文中。我们知道 རྒྱྲୟ 有布满、无空隙之意, 这样铭文中的 ཁ୍ୱାରୀର୍ଣ୍ଣ རྒྱྲୟ 可理解为由纯金制作的马鞍, 故而正文中的 ཁ୍ୱାରୀର୍ଣ୍ଣ ສ୍ରୀତି རྒྱྲୟ සାର୍ଥକ 也理解为“盖以由布满金的孔雀羽”比较妥当。

69 𠂇可能是𠂇的误写。

70 翁应为 翁 的误写。

71 “镇心”作为一种命价出现在藏巴汗的《十六法》(बैषष्टि प्रवृत्तिशास्त्र)中，参见《藏文古籍整理与研究》第20期：《藏文古籍整理与研究》2016年第1期：“藏文古籍整理与研究”，2016: 71, 88.

72 翳应为 眇 的误写。

73 字面意思为“空间”，因第 76-78 行讲述的是收拾尸体，此处空间或可理解为墓葬的空地，这样后面的作为陪葬品的马、牛、锦缎、青稞、绵羊等也好理解。关于吐蕃时期葬礼仪轨的次第见敦煌藏文文献 P.t.1042、1134。

74 克，为西藏古代的计量单位，一克约等于 20 斤。

⁷⁵ 见于藏巴汗的《十六法》中，为三大赔偿之一，赔偿内容涉及马、驴、谷物等等。⁷⁶ 2016: 89-90.

76 即 爾。

⁷⁷ 这种说法见于藏文世俗法规文献中，见《噶拉·南喀·扎西嘉措》卷之三，第152页。2016年。

78 約與約同。

80 𩫑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但我们知道，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以𩫑来代替𩫑（眼睛）的例子很多，𩫑指价格。

81 即 纲

82 लैण वृ ष्टिण त्रै।

83 𠂇可能是𠂇的变体。

⁸⁴ 珍为古典藏文字体的古藏文拼写方式，后者指法律、惩治、戒律等等。该词在吐蕃碑文中一般以“ཇི་ལྡ
ཇි་དැන්”（不受牵连）“ཇི་හිං”（不受处罚）等形式出现。原文中的ཇི应为判定之意，ཇི་ལྡ即指“判定给儿媳及其子女的（银两）”。

85 飾 本意指奴隶。

86 班智为 班智的另一种拼法，前者为及物动词，后者则为不及物动词。敦煌藏文文献 P.t.1071、1072、1073 号中出现的都是不及物动词，即 班智。

91. ཆི·ཆි·ຕ්‍රණ⁸⁷ དང·ཤණ | ສ·ຢුණා·དང·ජා·པණ | 弥药⁸⁸ 和塔克⁸⁹。热甲⁹⁰ 和那木巴克⁹¹,
92. ཚි·ནැ·දང·ඡී | ཤු·න·දං·ཡෝ·ඣා·න·තං·යෙශ්‍ය | 底岱和斯⁹², 马茹和尧嘉、茹邦等,
93. ວණ·ශ්‍රු·ෂ්‍රං·ස්කු·ක්·කු·කු | යු·ව·ව්‍යං | 九种姓氏及八十七座村庄。彭
94. යු·ව·ශ්‍රු·ෂ්‍රං·ස්කු·ක්·කු | විච්·ක්ද·ද්ර·ස්කු·ව්‍යං | 域⁹³ 地方的加擦桑, 农田一百四
95. ම්කු·ක්·ඡ්‍යං | රුණ්·ශ්‍රු·ෂ්‍රං·ස්කු·ක්·කු·යා | 十五朵尔⁹⁴。卓吉塘仁姆
96. මකං·ඡ්‍යං | ප්‍රං·දං·යු·ව්‍යං·ක්ද·ක්·ශ්‍රු·වා | 以上, 邦日仲仓尖以
97. මකං·ඡ්‍යං | මණ·දං·ක්ද·වද·ද්ර·ස්රු·වා·ශ්‍රු·වා | 下, 以扎玛尔曲多隆拉
98. මකං·ඡ්‍යං | ම්කු·දං·ස්කු·ක්ද·ශ්‍රු·වා·වද·ඡ්‍යං | 为界, 以那隆沃木仓为界,

87 敦煌藏文文献 IOL Tib J 734、P.t.1185 中也出现过与 ཆි·ຕ්‍රණ 相同的部落名称, 其古典藏文的形式为 ཆි·ຕ්‍රණ。

88 如前所述, ཆි·ຕ්‍රණ 是古典藏文 ཆි·ච්‍රණ 的古藏文拼写方式, 古代汉文史籍中译作弥药, 即后来的西夏党项人的自称。吐蕃攻击党项始于贞观八年左右, 吐蕃所辖在西北与唐朝作战的军队中就有很多党项人。因史料所限, 西藏西部的党项群体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 但至少通过此铁券文书, 我们已知在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地区的居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党项人。

89 今尼泊尔下洛沃地区宇卡额 (අුජාල), 尼泊尔语称其为 Panchgao, 与藏语字卡额意思相同, 指“五个村庄”。宇卡额地区最南端的村庄称塔克 (ඡණ)。见达瓦次仁:《悉立考》,《西藏研究》2017 (4): 31。

90 热甲 (ස·ຢුණා) 是西藏西部地区的一个家族姓氏, 莲教伏藏史源流中有一个派别叫“ස·ຢුණා 与 ສ·ຢුණා 派”, 两个都是西藏西部的部落名称, 后者指 ສ·ຢුණා·යු·ස, 又称 ສ·ຢුණා·යු·ස、ສ·ຢුණා·යු·ස 等。ස·ຢුණා·ද්ර·ස්රු·ව්‍යං 和 ສ·ຢුණා·යු·ස 从莲教掘藏师 ສ·ຢුණා·යු·ස 得到了莲教心部的经典 (ස·ຢුණා·ත්‍රා·ව්‍යං·යු·ස ම්කු·ව්‍යං·ක්ද·ද්ර·ස්රු·වා·යු·ස දේශ්‍රු·ව්‍යං 1991: 237. මරුදු·යා·මින්·ත්‍රා·ව්‍යං | මින්·යු·ස ද්ර·ස්රු·ව්‍යං මින්·යු·ස අග්‍රිදරුවක්ද 1987: 273-274)。另, 莲教掘藏大师辛钦鲁噶 (996-1036 年) 的众弟子中来自热甲家族的共有三个, 即 ສ·ຢුණා·යු·ස·ජ්‍යුණා、ස·ຢුණා·යු·ස·ජ්‍යුණා 和 ສ·ຢුණා·යු·ස·ජ්‍යුණා·යු·ස。参见 ສ්‍රාණා·ත්‍රා·ව්‍යං | මින්·යු·ස මින්·යු·ස ද්ර·ස්රු·ව්‍යං | මින්·යු·ස මින්·යු·ස මින්·යු·ස 2014: 35.

91 ອඳ·ඡ්‍යං 应为 ອඳ·ච්‍රණ, 吐蕃在于阗所设立的军政机构中就有这一部落群体 (M.Tagh.c.ii.0042), M.Tagh.c.iv.0036 号记载三个 ອඳ·ඡ්‍යං 曾随同一位名叫戎鲁的人来过帕班 (පර්වත Parvata) 对面的尼雅河 (ශ්‍රුෂ්ඨත්‍රං) 河岸, 参见 F.W. 托马斯著, 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0: 233。按照吐蕃在新占领土迁设部落的原则, 象雄千户迁设在于阗属国, 苏毗千户迁设在萨毗军镇, 这样原部落与所迁设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此, 居于于阗的 ອඳ·ඡ්‍යං 原部落应该在西藏西部地区。另, ອඳ·ඡ්‍යං 的 ඡ්‍යං 在象雄十千户中五个名称组成部分中都有这个词, 这与象雄部落名称的地方色彩有密切关系。

92 据《拉喇嘛益西沃传》记载, 阿里托林寺的香火中有 ඡ්‍යං 的部落, 这与 ඡ්‍යං 可能指同一部落。参见 ສුණා·යු·ස මින්·යු·ස ද්ර·ස්රු·ව්‍යං | ඡ්‍යං·යු·ස මින්·යු·ස ද්ර·ස්රු·ව්‍යං 2013: 35.

93 根据原文最后一行, 彭域 (ව්‍යං·යු·ස මුද්‍යුල) 为结辛家族的根据地。在吐蕃时期, 结辛家族有属于象雄十千户中的古格千户; 在后吐蕃时代早期, 结辛又是穹隆 (ශ්‍රුෂ්ඨ) 最著名的家族, 勿庸置疑, 穹隆在吐蕃时期属于古格千户的。纵观史料, 从吐蕃早期至公元 10 世纪, 结辛家族的根据地一直以西藏西部为主, 彭域也应该是古格千户的一属地。然而, 从整个象雄十千户的分布格局看来, 古格千户的管辖范围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比如今日喀则市西部地区有可能由古格千户来管理。笔者认为彭域与墀松德赞为结辛家族颁布敕书地点卓旭 (仲巴县) 地方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 如今仲巴县境内的偏吉 (ව්‍යං·යු·ස) 乡与彭域地名的相似性也不能忽视。

94 朵尔, 系计量单位, 一朵尔等于一对牛一天能耕作的农田面积。

99. དར·ཀྱි·ද්·ཡිස·ඩ·මීද·ශ්ව·යු· ສගා· මක·
以巴吉茹列玛辛甲右为中界，赠赐。
100. བුද· ཁේ· සටි· ག්ලි· ཕිඩ· དන්ස· ཉෂ්ං· ສගා· මක·
已有人、田、牧等，施恩
101. ອංද· ດ· ཁ්ල්ස· ອිඩ· ສුං· ຢක· ཁේද· ດසද· ມහුද·
购买，管辖楚萨以上，
102. ດර· ສගා· මක· ແລ්ල· ສුං· ສුං·⁹⁵ ດ· ດක්මා·
赠赐。比角⁹⁶人等
103. ສැඩි· ສුං· ສිඩ· ກේඩ· ດ· ດක්මා· ດසද·
作上等大门卫，赠赐。
104. ສගාදි· ອං· ສුං· ດසද· ດක්මා· ຕිඩ· ດත්ද· ສුං·
司职尚伦臣，压制（强者），
105. ສගා· මක· ແල්ල· ຕිඩ· ດළුද· ດි· ດක්මා·
赠赐。尤其，若有大小过失，
106. ຖුද· ສුං· ດ්ලුං· ສුං· ສුං·
不杀，不被流放。若遇人离间，
107. ດ· ປුද· ດ· ຍද· ດ· ສුං· ດසද· ດ්ලුං·
不可不加考察而听信。
108. ສගාද· ດන්ද· ສුං· ສුං· ອංද· ດසද· ດගාද·
惩处不可伤及命与眼。赠赐。
109. ຕිඩ· ອිඩ· ຕිඩ· ດන්ද· ດක්මා· ດසද· ດගාද·
(有关)田产和牧场，
110. ແල්ල· ດ්ලුං· ອංද· ດසද· ດගාද· ດි· ອං· ດක·
不另做吩咐。此等
111. ສගාද· ດ⁹⁷ ດ්ලුං· ສුං· ດසද· ດගාද· ດ්ලුං·
详细敕文刻于石碑。
112. ສුං· ສිඩ· ກේඩ· ດ· ສුං· ດළුද· ດසද· ດ්ලුං·
大臣结辛·赤旺觉布布拉
113. ສුං· ຄ· ທුද· ດ්ලුං· ດසද· ດ්ලුං·
珂之后代子孙，不以疏远；
114. ດසද· ພුව⁹⁸ · ດන්ද· ດගාද·
奴户⁹⁹ 不以没收；另
115. ສුං·¹⁰⁰ ສුං· ດ්ලුං· ດසද·
不作变更；不听信谗言；
116. ສගාද· ດන්ද·¹⁰¹ ດ්ලුං·
不需辯诉；不依民
117. ດගාද· ດන්ද·¹⁰² ດ· ດන්ද·
律惩处；未考察不以

95. ສුං· ສුං· 是斯比提 (ශ්වි) 和角拉 (ශ්වා) 的缩写。

96. ສුං· ສුං· 是吐蕃时期象雄十千户中的斯比提 (ශ්වි) 和角拉 (ශ්වා) 两个千户的缩写。斯比提又称 ສුං (一种脱落去加字 ພ的方言变体)，位于印度喜马偕尔邦北部拉胡尔 (එන්ලු) 与库鲁 (kullu) 之间。藏文史籍称其为斯比提小千户 (ශ්වි· ສුං· ສුං)，但迄今我们在敦煌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中没有找到这一千户。令人兴奋的是文森特最近在阿里日土县境内发现了刻有斯比提千户 (ශ්වි· ສුං) 的古藏文石刻，见 John Vincent Bellezza, "The Rock Art of Spiti: A General Introduction."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41 2017: 58. 汉译文见 [美] 约翰·文森特·贝勒扎著，永保藏译：《斯比提岩画概述》，《藏学学刊》第24辑，2021(1): 307-309。角拉也是吐蕃时期象雄十千户之一，据《吐蕃编年史》记载，角拉于674年背叛。因676年赞普墀芒论去世，后年结辛·库补布与角拉仍足廓尔心生叛逆，使整个象雄反叛于吐蕃，象雄这一叛乱直到680年才被吐蕃平定。

97. ສගාද 即 ສුං·

98. 根据古藏文文献的记载，此处 ດසද· ພුව 应为 ດසද· ພුව，见 P.t.1071-1: 19, 20, 30, 57, 61, 71, 75, 102, 103, 125, 128, 131, 163, 166, 171, 174, 204, 207, 208, 210, 237-240, 244。

99. ດසද· ພුව 即 ດසද· ພුව 的变体， ສුං 的动词为 ສැඩ (使用)， ພුව 为土地。参见陈践：《陈践藏学文集》(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 472。

118. བྱନ୍ତି¹⁰⁰ མକ୍ରଦ୍ୟମାରହଦ୍ୟରେ । བྱନ୍ତିକେ ଶିଳ୍ପିନାନ୍ଦ ଚାଲୁଛି ।

119. ଗର୍ଭଣାଶ୍ରଦ୍ଧମାନକୁହନ୍ତରୁ ସମ୍ମଦ୍ଦିଲ୍ଲମାନାର ।

120. କୈଣାମାଯିନ୍ଦ୍ରନ୍ତରୁ ଘକରମାନମାନାମାନ ।

121. ଶିଖିଣିଶ୍ରୀକୃତକରୁଷାମାନାମାନ¹⁰² ମାନମାନ ।

122. କୁକୁରକୁହନ୍ତମାନମାନମାନମାନ ।

123. ମାନମାନକୁ ॥

124. ଯୁଦ୍ଧମାନଯୁଦ୍ଧଶ୍ରୀକୃତମାନମାନମାନ ॥

残虐¹⁰¹。(为)大臣赤旺
觉布(支?)拉(珂?)之子孙,
如此赠赐,
誓文永固。
具有清晰印章的敕文,(从)制于
香香
东孜之文抄录。
是也。
彭域地方的结辛威严之标也。

全文翻译大意如下：

苍穹之赞普，厚土之领主；人君、神之化身；自天界下凡，成为直立人之王、长鬣动物之所依。蕃之悉补野赞普墀松德赞（755-797年），兔年冬末月，驻于卓旭之毗瓦宫堡时，为古格部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所授圣谕之要义。大臣结辛·赤旺觉布支珂之历辈先祖，对历代赞普忠贞不二，大有功绩。

先祖墀达乌聂斯（6世纪）时期，大臣结辛·瞻林赤顿协尔赞尼，于突厥之地任大将。他与娘、温、农三氏及信使蔡邦氏等联合，灭吐蕃十二小邦；象雄、阿柴、塔波等部也都被招致麾下。如此，服侍赞普王室有功。

先祖墀囊日松贊隆朗（6世纪）时期，大臣结辛·阿雅杂木苏任大将军，进军巴尔蒂时，英勇无比。使政治兴盛而得敕文。使吐蕃边、中部各地稳固。如此服侍赞普。

先祖松赞干布（617-649年）时期，大臣结辛·芒布支赞拉尼进军中原。于噶当木之甲塘地方与汉军对峙时，英勇无比。为此，他获得了虎皮萨钦褂。他与噶尔东赞玉松、达杰芒布支松朗二人联合，修建吐蕃四宫堡；吐蕃全境分为四翼；松巴（苏毗）被分为多个部族等，以服侍赞普。赞普吩咐，授予他小金字告身。

101 ལྷྲྲ ། རྒྱྲ ། རྒྱྲ 应为 རྒྱྲ ། རྒྱྲ 的误写，参见陈践：《陈践藏学文集》（下），2018：456。

102 ସାହୁ ମଧ୍ୟ ସାହୁ

赞普墀松德赞时期，大臣结辛·赤旺觉布布拉珂，于那尔地方攻打泥果时，自鸡年以来，九年间，进行九次大战。此时，他逞勇、贤之能，威镇边疆，以护王之身与政，有功如前。他不顾自身安危，政功如数献上。获得狮子皮领衣，被授予小玉字告身，拥有如此极好的赐品。历代赞普时期，结辛家族之历辈先祖及其后人，对赞普服侍有加。是故，被赐予私人财产的同时，授予敕文。

领主后人觉姆丹库尔之后代子孙等，永永远远，世世代代，一切后人，对其（结辛家族）后人不得改写（文书），不得变更（优待），不得减少（财权等），不得弃之，不得（另）下敕文以剥夺（财产等）。复仇、奖惩、（死伤）赔偿等，也要与历代先王所赐敕文内容相符合。（敕文上具有）文印、护印等，所言（内容）清楚。于西日西塘赠赐，吾之大臣结辛·赤旺觉布布拉珂，其后代子孙，（若）被杀或被伤、（无论）被何人所杀，（为）供奉天神和聂神、（丧葬仪式中）为镇斯魔，需用九氏男奴、九氏女奴、九支金箭、九条哈达、九件饰以九叶丝绵的玉质纺锤轮、九只门地的绵羊、九只门地的山羊、九克青稞、九克干果、九克酥油、九古让及九岗等。拉日山和波日山，要以由金布满的孔雀羽铺盖；拉措达热玉托坚湖，要以天珠铺满；格子形的拉塘亚塘，（要以）丝绸铺盖。“池叶”（似指某种仪式），需要有九条绸缎、九章布金钱及九头牦牛。盖尸者，需要有上等的铠甲九件。为驮负尸体，需九匹良马。为镇（死者）心（魔），需百两金子和九件上品玉器。为填充墓室空地，需九匹良马、九头上等牦牛、九件上等萨沃锦缎、九克青稞和九只绵羊。需赔偿的牛群，从西日西塘的牲畜中赠赐。赠赐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两九钱九“那木”，以及九只羊和九“宁”。需要以马赔牙齿，牦牛赔指甲，绵羊赔头发；寡妇之布价为九两；为憋回眼泪，需要一母牦牛和一件丝绸；加仁，（需）一匹马，用红布包裹，穿巴玛尔。（给）儿媳和子女判定的为四百两。（死于）大小武器，则需按上等肯民奴隶的同等（命价）赔偿。赐予人、田、牧场为弥药和塔克，热甲和那木巴克，底岱和斯，俱茹和尧嘉、茹邦等九氏部落、八十七个村庄。赠赐彭域地方的加擦桑，一百四十五“朵尔”农田；卓吉塘仁姆以上，邦日仲仓尖以下，以扎玛尔曲多隆拉为界，以那隆沃木仓为界，以巴吉茹列玛辛甲右为界（的领地）。赠赐已有人、田、牧场等恩赐或购买，（可）管辖楚萨以上（的地方）。赠赐比角人等作上等大门卫。赠赐（可）司职尚伦臣，压制（其他强者）。另外，赠赐（家族中的人）若有大小过失，不可取其性命，也不被流放。

若遇人离间，不可不加考察而听信。惩处不可伤及性命和眼睛。（有关）田产和牧场，不另做吩咐。此等详细敕文刻于石碑。大臣结辛·赤旺觉布布拉珂之后代子孙，（王室）不以疏远；奴户不以没收；不可变更；不可听信谗言；不需辩诉；不依民律惩处；未考察不以残虐。（为）大臣结辛·赤旺觉布布拉珂之子孙，如此赠赐，誓文永固。具有清晰印章的敕文，（从）制于香香东孜之文抄录。是也。彭域地方的结辛威严之标也。

三、小结

关于吐蕃历史方面的史料，主要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石刻碑文、简牍以及后期的历史典籍等，鲜有其他。然近些年来，西藏各地不时有新的历史文献被发现，特别是在西藏西部地区。这些新近发现的史料，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所讨论之《吐蕃铁券文书》，是一份新近发现于西藏西部的吐蕃历史文书。根据目前的初步研究，它应该是一份吐蕃墀松德赞时期授予古格地方结辛家族敕文的抄录本。具体被抄录于何时，目前暂时难以确认，《文书》所涉猎的历史人物等亦难以一一辨析。根据这份《铁券文书》的内容，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曾为古格部大臣结辛·赤旺觉布布拉珂家族颁赐一份敕文，原因是他和他的先祖自赞普先祖达乌聂斯时期以来就对历代赞普王室忠贞不二，且有功于赞普之身与政。具体内容涉及吐蕃赞普达乌聂斯、墀囊日松赞隆朗、松赞干布和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等，也涉猎吐蕃解体后结辛家族的后人、丧葬仪式等具体内容，可谓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补充史料。本文对该文书进行了尝试性的翻译与解读，初步讨论其性质、成书时间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等，意在为学界提供一份新的史料。不妥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阿贵 《西藏大学学报》副主编，副研究员

索南才旦 西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ABSTRACTS

"The Yak Mirror" and the Study of "Tibetan Handled Mirrors"

Li Yongxian

(Tibet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Starting with the recent appearance of the "Yak Mirror" in Tibe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four handled copper mirrors found in the Yarlung Tsangpo River basin, including the "Qugong Mirror" in Lhas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copper mirrors are early indigenous Tibetan bronze artifacts, influenced by the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in terms of their design. Their metallurgical and cast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ir mirror-and-handle assembly metho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uthwestern Aborigines Bronze Technology System" in the eastern plateau. They differ in technical origi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handled copper mirrors unearthed in the Langchen River basin in western Tibet. These mirrors hold significant regional importance for Tibet's "Early Metal Ag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Iron Smelting related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Site**

LiYuniu¹ Sun Tianqiang¹ Zhang Mengyi² Li Shuai¹ Yang Feng¹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y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ron objects and slags that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at Piyang-dongga village in Tsada county. The results of metallographic and elemental studies provide the first and earliest evidence of bloomery smelting technology in Tibet as early as the third century AD. The iron smel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xcavated iron objects possibly belong to the "northwest system" and are probab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lateau Silk Road.

**Re-investigations of the Two Gtsang-Grong Steles
in Drachee (Grwa phyi) of Central Tibet**

Shawo Khacham

(Tibet University)

Gtsang-Grong steles ar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belief system of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lready studied these two steles, their basic results were not complete. Based on multiple on-site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combines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steles, and proofreads all the inscriptions. The inscriptions reflect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teach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hyi dar period, and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monastery by monastic and lay communities. From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events recorded on the stel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two steles were erected during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nfluence from India and Central China can also be determined from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steles.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from Western Tibet

Ngakon and Sonam Tseta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Tibet University)

Recently, a "folk copy" of the so-called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was found in Ngari, Western Tibet.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pertain to the decree granted by the Tsanpo Khri Srong lde btsan to his minister Rgye shin Khri dbang gtsug pud rje la khwe, and the subsequent inheritance of the imperial edict within the family. Although the imperial decree mentions historical figures like Mes Khri Sta'u snya gzigs, Khri Gnam ri strong btsan, Srong btsan gsam po and Khri strong lde btsan, along with their related activities, these events are not found in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making speculative interpretations unwi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ranscription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manuscript, aiming to serve as supplementary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ubo perio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Li Zhipeng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ng and Tubo. Due to the scarcity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ambigui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has been limited in-depth explor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regarding the routes and historical impact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lens of documentary sources, cultural relics, folklore, and more, focusing on political interactions,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ultural blending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ea-Horse Ancient Road and the Plateau Silk Road to provide a more objective overview of the route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occurred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Cao Zhongju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Archaeology of the Silk Roads,
Northwest University)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spanned over eighty years. Looking at the existing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e main focus has been on case stud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lics related to the road, but fail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content within a unified framework. Most of them appear to be self-contained and lack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 concise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This include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the road network,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long the route, and studi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habiting the Qinghai Route.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thnic theories, it is imperative to rethink and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reflected in the Qinghai Route. 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nity" of the Qinghai Route, explore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ethnic groups and the route,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study of route changes.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 Road's Qinghai Route.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aza Bridge in Lanzhou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i Jianju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元符 er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ng army abandoned Shanzhou 鄞州, retreated to Huangzhou 涿州, and repaired the Anxiang 安乡 Bridge in Hezhou 河州 and the Baza 把拶 Bridge in Lanzhou to facilitate support for Huangzhou. The Baza Bridge got its name from the crossing of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Baza Ferry. It guarded two fortresses o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ere later named Jingyu Pass 京玉关. The bridge was formerly known as the "ancient floating bridge" at the stream outlet Zhuolong 斫龙 and the "Guangwu Bridge" in Guangwu 广武 County of Lanzho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Jingyu Pass consisted of two city gates,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ity. The southern city was divided into an old city and a new city. The old city was Yijitan Old Fortress 益机滩旧堡,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era and was destroyed by an earthquake in the leap-month of March of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宣和 era. The new town was called Yiji Fortress,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era and was later renamed Anqiang 安羌 City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Baza bridge is situated 40 km west of Lanzhou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controlling and guarding the routes leading west from Lanzhou to Miaochuan 邈川 City (Huangzhou), northeast from Miaochuan City to Zhuolong City, and northwest from Lanzhou to Liangzhou. It serves as a crucial inflection point for the study of traffic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orthern Song, Xixia, and Qingtang in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Thangka of Milarepa's Lif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iang Yunyun

(School of Art at Sichuan University)

The thangka depicting Milarepa's life, housed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is currently know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thangkas of its kind.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painted scenes in thirty section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Milarepa, the *Rje btsun chen po mi la ras pa'i rnam thar thar pa dang thams cad mkhyen pa'i lam ston*, that was compil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1452-1507), alias Rus pa'i rgyal mtshan in 1488.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biographical thangka of Milarepa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biography. The thangka illustr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ri gung bka' brgyud lineage from Milarepa, trac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legacy back to Milarepa's practice site at La phyi. This type of thangka was firstly creat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and his disciples who incorporated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narratives into its com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hangka was to promote the newly emerging biography and songs of Milarepa.

A Thangka Set of Śākyamuni and the Sixteen Arha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Li Kai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owns an old collection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depicting Śākyamuni Buddha, his two disciples and the Sixteen Arhats. These paintings exhibit a distinctive style, combining elements of both Han and Tibetan culture. They stand out with their rich Han-style influences

and a unique portrayal of birds, animals, and scenes of feasting. By comparing these Thangkas with another set of seven thangkas from the same museum's old collection featuring Tibetan inscription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is set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likely originated from the tenth Karmapa Chos dbyings rdo rje (1604-1674), a famous Tibetan arti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se two sets of Thangkas of Arhats represent a unique style known as "Han-style Thangkas" and serve as remarkable example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with broad, multifaceted, and deep interactions.

Basic Demonstratives $nə^{53}$ and $tə^{31}$ in the Pada Tibetan

Song Xiao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The basic demonstrative system in the Pada (Dba' sde) Tibetan language consists of $nə^{53}$ and $tə^{31}$. They are used as argument independently, and can also modify nouns in noun phrases. These two demonstratives may precede, follow or be juxtaposed to a noun within a noun phrase. Juxtaposition is typologically rare. Different demonstrative and noun orders have different deictic functions and referential meanings. Postposition is the dominant order in Written Tibetan. $tə^{31}$ in postposition conveys definite meaning which is induced by pragmatic function. Preposition conveys distance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grammatical system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Regional Knowledge of Kham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uo Hong and Liu Xiaoxu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ropagation of Catholicism by 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in the Khams area enter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exclusive influence. As a vital bridging area connecting Tibet and the interior of China, Khams was a crucial passage for French missionaries on their journey into Tibet. Notable figures like Evariste Huc of the Lazarists, Jacques Léonard Pérocheau and Charles René Alexis Renou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discussed and documen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Khams area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and travel diaries. Some of these missionaries, such as Huc, Renou,

and others,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Kham area and provided detailed records about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d by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ibet, their discussions and records often contained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deviated significantly from historical facts. These misconception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perceptions and cast shadows over subsequent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lineation of Sichuan and Tibet.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Missionary Region by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Fan Changl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order to exer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Tibet, the Vatican established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in 1846, and sent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ibet to preach there. However, out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ibet strictly prohibited foreig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without permission. As a result,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were severely hampered, and it had to turn to the Sichuan Missionary Society to "borrow land" in order to gain a foothold. In 1858, Bishop Desmazures of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Bishop Desfleches of Southeastern Sichuan, and Bishop Pérocheau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met with the diocesan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ociety's missionary activities from Tibet into Sichuan Province. This meeting between the ecclesiastical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resulted from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inability to enter Tibet. I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factions within the church regarding the expansion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Finally, it also shows that at that time both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strictly prohibited Europea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and spreading Catholic religious culture.

Recording Tibet: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ib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ao Guangrui and Zhang Zhi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dominated the field of using images to document Tibet. The Western world's visual impression of Tibet wa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British, especially by the border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Raj. Photography served as a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y, a mea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 important intelligence-gathering tool, and an effective visual medium for shaping the image of Tibet that was conducive to British interests. British diplomatic photography in Tibet concealed the power dynamics the British and Indian colonial governments hoped to convey i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ibet. It reflected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and Tibetan elites. These photographs could also portray Tibet as "distinct" in term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British Tibetan photography was constantly re-selected and re-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Some were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while others were deliberately downplayed or forgotten.